

“七·七”事变爆发后美国对日纵容的原因初探

韩永利

中日全面战争初期即“七·七”事变爆发后,美国对日本实行纵容政策的原因,国内外史学界均有论著与论文进行评述。苏联史学界认为“反苏”是美国对日纵容的主要原因;西方史学界则认为美国陷于国内纷繁的事务,所以采取孤立于外界的政策。除此之外,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也是不容忽视的:美日之间密切的经济关系,使处于危机中的美国还有必要维持同日本的贸易往来,暂缓它们之间日益激化的矛盾;军事力量的不足,美国在中日战争初期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政策,视两虎相争之后的有利局面而轻取远东太平洋霸权;欧亚紧张局势的状况对拉美地区影响甚大,美国必须在介入欧亚之争之前首先稳定“后院”,实现世界第三利益集团各国之间的联系和团结^①,加强美国争霸世界的战略地位。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美国一直处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打击之下。由危机所引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日益严重的“经济战”,使国际经济格局较一战后十年有了很大的变化。美国在二十年代世界贸易中“独居魁首”的地位已告结束。因此,美国力图通过对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行径采取经济纵容的绥靖政策,暂时稳定两国间贸易关系。

三十年代世界经济格局不利于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削弱的英国重新登上了世界经济舞台,在英联邦的主要地区建立了“英镑集团”^②,加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以法国为首的“法郎集团”,控制了中西欧市场。重新崛起的德国建立起东南欧、南美诸国在内的“广泛经济圈”,使美国对欧洲等地的商品和资本的输输出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美国对外贸易额急剧下降。国外投资由1929年172亿美元下降

为1939年的114亿美元,减少了三分之一^③。由于大西洋彼岸的欧洲已形成一道不可逾越的经济壁垒,美国不得不把主要视线集中于拉美和远东地区。在亚洲,日本则是美国加工工业的主要市场^④。从1933年到1937年,日本在美国对亚洲总输出中所占比例超过49%。在美国总进出口中日本占7.8%,而中国只占2%—3%。日本在美国对外投资中占2%—3%,而中国只占1%—2%^⑤。为了权衡经济利益的利弊,美国不得不考虑如何维持同日本的贸易关系,以维护垄断资本家的利益。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美国有一部分称为“干涉派”的人士主张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维护美国在远东的传统利益。美国驻中国大使詹森曾警告说:日本一旦在太平洋上的亚洲一侧占据统治地位,它就会使用廉价的中国劳动力去生产商品,再用廉价的日本船只运输,“在美国市场向我们挑战。”^⑥他们敦促政府对日本断绝战略物资供应。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毕德门发表演说,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前国务卿史汀生在《纽约时报》刊登的一封信中有力地陈述了美国应停止对日战略物资贸易的理由,他认为,要是继续与日贸易,“将来就会给我们带来战争的危险,而这正是我们现在力求避免的。”^⑦但是,当时主张经济制裁的人在美国国会中并不占多数,不能对美国远东政策起决定性作用。

据美国经济学家安娜·罗伯特所著的《美国的统治者》一书记载,30年代美国国家资源委员会对美国最大的250家大公司进行调查的结果表明,以摩根、洛克菲勒为首的八大财团控制着美国的经济命脉。其中,摩根、杜邦、洛克菲勒等财团早就与日本财阀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它们利用中日战争贩卖军火和战略物资获取巨额利润,不希望罗斯福政府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它们支持的亲德派、亲日派及孤立派,在国会两院中占了绝对优势,决定着美

国这一期间远东政策的制订与实施。慑于他们的压力，罗斯福未能对日采取强硬的政策^⑧。正如美国国务卿赫尔所说：“美日之间的贸易额为所有欧洲国家对日贸易总额的两倍，如果用经济制裁导致战争，美国也同样得承受最沉重的负担。”^⑨美国《太平洋杂志》也认为：在研究是否实施禁止和日本贸易问题时，美国政府首先考虑到的是厂主的得失。

面对日本在中国侵略的扩大，华盛顿当局为了垄断寡头的利益，摆脱经济危机的冲击，采取了纵容日本的政策。“七·七”事变爆发后，美国政府故作姿态地发表了一系列的声明，没有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反而一再阐述美国的“互惠贸易政策”^⑩。7月12日，美国国务卿赫尔还公开宣布，在中日冲突中，合众国政府对日本采取“友好的、公正无私的态度”^⑪。7月16日，赫尔就远东局势发表声明，轻描淡写地说什么：“我们提倡民族和国际的自我克制精神，主张一切民族戒除强权政治的运用和干涉别国国内事务的作法。应本着相互帮助和调解的精神执行既定的条约程序。”这是为了“经济稳固地增长和全世界的稳定。”此后，他在和日本驻美国大使就中国事态的一系列交谈中，仅仅强调各国之间只要贸易平等，不打经济战，那么就没有军事冲突。白宫主要人物的讲话，无异给日本一颗“定心丸”。美国不会对日本施加经济压力。因此，日本内阁首相近卫文磨在议会演说中宣称：“日本帝国要采取的唯一措施，是给中国军队以彻底地打击，使之丧失斗志。”^⑫8月29日，24名美国议员要求对中日双方实行“中立法”，但美国政府无视战争状态存在的事实，有意缓靖日本，宣称：“除非（中日）宣了战，或者事态发展表明，该冲突将导致一方战胜，或者中立国的自由贸易受到了干扰，否则，总统……宣布战争状态的存在是不必要，不明智的。”罗斯福确实迟迟没有宣布中日处于战争状态，直到日本封锁中国海岸港口的情况下，他才于9月14日发表声明，禁止美国官方船只运送武器、军火和军事器材去中国和日本，其它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如运送上述物资去中国和日本，一切责任和危险应自行负责^⑬。这种貌似“中立法”而又不是援引“中立法”全部内容的做法^⑭，实际上是允许垄断资本家继续与日本贸易往来。1938年2月1日，日本“外交通报”杂志公开供认：美国的政策确保了日本“取得军用物资的便利”^⑮。

对美国政府的一番苦心，日本心领神会。1937年11月，日本内阁设立委员会专门研究是否对中国

正式宣战问题，他们认为，假如宣战，将迫使美国全面施行“中立法”。这样，日本重要战略物资来源就会被切断，将导致日军在对华战争中处于不利的境地。最后，作出了“还是不发布宣战书”的决定^⑯。日本的这一决定正是摸清了美国的底细，利用了美国缓靖政策的结果。

由于政府的纵容政策，美国对华贸易大幅度下降，相反，美国战略物资却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1937年下半年，中国从美国进口额下降到七千三百万美元，1938年下降幅度更大。据显然缩小了的官方材料，日本在1937年——1939年间获得了七亿六千零九十万美元的各种美国商品，其中37年至38年获得五亿二千八百万美元以上^⑰。美国前国务卿史汀生坦率地指出：“日本的侵略得到我国大力支持，这种侵略行为不仅受到支持，而且我们的援助是如此有效，如此举足轻重，如若断绝援助，这种侵略就可能被制止和停止。”^⑱

为摆脱危机不惜给日本侵略者输血打气，这就是1937年间美国政府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在中日战争初期所施行的纵容政策的根源。

二

帝国主义国家之间霸权的争夺，最终取决于双方军事实力的对比。日本对中国的武力入侵，是对美国夺取远东太平洋地区霸权欲望的公开挑战。但是，“七·七”事变爆发时，处于危机中的美国，同日本相比，在军事力量上并不占有优势，这是美国对日缓靖的另一重要原因。

首先，在陆军方面，美国大大落后于日本，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陆军才由三十年代初期的145,000官兵发展到190,000人。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和其它种种因素，部队的装备陈旧，大多数人都还使用着一战时期遗留的武器^⑲。据1935年美国《幸福》月刊报道，虽然美国步兵决定采用M—1加伦德半自动步枪，但总数还不足装备一个团。美国陆军主力布署在西半球，防御重点在欧洲^⑳。而1937年日本的陆军则拥有400,000万训练有素的部队。

一战以后，美国在太平洋上与日本相对抗主要是依靠海军。但据美国《亚细亚月刊》报道，1935年美国仅在主力舰方面接近于华盛顿条约所规定的吨位，而在其它舰艇的实力对比上，美国为10，日本为14.4，美国比条约规定的数字要少430,500吨，明

显落后于日本。同时地处两洋的美国,海军力量分散。尽管1921年由美国陆海军部长批准的“桔”计划中规定要尽快在西太平洋掌握制海权,并以海军为主承担对日进攻战^②。但是,由于“桔”计划并未有效施行,因此,海军力量并没有明显增强^③。

从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军事部署来看,美国这一期间应付与日本武力冲突的准备也是不充分的。按照美国的“桔”计划,从北部的阿拉斯加,经太平洋中部的中途岛到南部的西萨摩亚的帕果帕果岛,是美国称为它在太平洋上的“生命线”。关岛和菲律宾则为美国在西太平洋上的“进攻型”的、富有战略价值的势力圈。但是,华盛顿条约规定,美国不得在阿留申岛、菲律宾、关岛等接近日本区域建立和扩建海军基地。当日本在中国大陆将战火燃烧到华北、华中、威逼华南时,美国不但在西太平洋的势力范围内没有建立起有效的防卫,而且阿拉斯加的不设防,使美国甚至没有完成它的所谓“防御线”的基地建设。美国军方认为,“由于美国过去一直忽视海陆军建设,它不可能在西太平洋上与日本打仗”^④。

由于军事实力的不足,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美国政府期望在中国问题上对日暂时让步,来等待有利时机和有利地点同日本决一雌雄。

因此,美国在对日本侵略中国采取纵容政策的同时,加紧增加太平洋上的军事力量,这两个步骤相互呼应,构成中日全面战争初期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美国纵容政策的特殊内容。

1937年8月23日,日本大规模进攻上海。27日,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致电美国国务院,认为美国对中日战事应该采取的政策是:“避免介入,……保持中立,……维护美日双方的传统友谊。”9月2日,赫尔复电格鲁,基本上同意他的意见。1937年8月,日本获悉有部分美国飞行员参加中国军队对日作战,马上告知格鲁说日本要在报上发表文告抗议美国,格鲁立即向日本保证:“美国政府‘将尽力阻止自己的公民参加外国军队’。”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对美国的态度表示满意^⑤。10月,布鲁塞尔会议期间,美国代表戴维斯向国务卿赫尔提出,可否考虑由英美法联合派军舰向日本施加压力,赫尔一一加以否定。1937年12月12日,日本炸沉了停泊在长江水面的美国军舰“巴奈号”;格鲁担心会不会再发生一次“缅因号”事件,结果罗斯福只是指示赫尔,通过日本驻美大使向日本天皇本人转达美国的抗议。最后仅由日本赔偿三百万美元而告结束。美国政府在1937年8月23日、9月14日、10月6日关于中日

战争发表的声明中,都明白表示它将保持“中立立场”,并不企图“对是非曲直作一判断”,并且还将在中国驻扎四十余年的军队撤出了中国^⑥。罗斯福还警告在中国的美侨:“谁宁愿留在中国,那就让他个人负责”^⑦。

在中国大陆对日本实行纵容政策的同时,美国也相应加紧发展军事力量,特别是扩建海军。罗斯福1937年同苏联全权代表谈到中日战争问题时,对美国的意图表述得很清楚:“条约是靠不住的,主要的保证是强大的海军,……,我们且看日本人是否经得住海上的竞争”^⑧。

从1936年到1938年,美国的实际军费不断增加。1936年为8亿8千万美元,1938年增至9亿8千万美元,而这些军费拨款偏重于海军,以应付日本向太平洋区域的扩张。以1937年为例,“美国拨给海军的军费为539,030,790美元,而拨给陆军的军费只有378,167,039美元。1938年,针对日本海上势力的威胁,罗斯福又要求国会拨付十亿美元建立“两洋海军”。同年,国会批准《文森海军法》。1938年3月,美国海军在夏威夷进行大规模演习。日本海军在中国青岛登陆之后,5月1日,美国海军又举行了一次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演习。同时,美国加紧在夏威夷进行大规模演习,建立空军基地,还计划在菲律宾每年征集陆军四万人,为保卫菲律宾增派一百艘轻便军舰、二百五十架海军飞机^⑨。但是,这些步骤无法挽回由美国纵容政策所带来的恶果。日本侵略步伐不断扩大。1939年2月,日本占领海南岛,3月占领南沙群岛,其海军基地接近印度支那、马来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为建立南进的基地创造了有利条件,形成与美国争夺西南太平洋的战略对峙局面。

三

在考察美国为什么绥靖日本原因时,我们不应忽视美国致力于稳定拉美后院的政策。因为在世界法西斯严重挑战面前,拉美同样出现了德日渗透的紧张局势,出于战略考虑,美国必须首先控制住西半球。

关于这个问题,人们通常认为,美国因为经济危机,无力干涉外部事务,只好奉行所谓“孤立政策”,以应付欧亚法西斯的威胁。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孤立”而言,也并非仅指美国自身的“孤立”,更大程度是要把美洲变为一个以

美国为首的、稳固的防御和进而对外扩张的基地。1937年间,尽管美国的世界战略还没有一个清楚的轮廓,但是,在对远东和欧洲的战争取“中立”政策的同时,全力对拉美采取频繁的外交攻势则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同这一时期德意向拉美猛烈进行政治经济渗透的威胁密切相关的。

早在1934年和1935年,德国就先后同阿根廷、巴西、智利等拉美国家签订了一系列旨在排斥美国贸易的双边协定。从1934年至1938年,德国在拉美各国输出中从7.9%增至10.5%,在输入中从9.9%增至16.2%^②。德国航空公司在拉美更占有明显的优势。三十年代中期,德国对拉美的贸易超过了英国,仅次于美国,一跃而居第二位。1931年日本在拉美的进口中仅占0.1%,到1935年则达3.7%。在巴拿马、多米尼加和巴拉圭的进口中,日本甚至占了14%。1931年至1938年七年中,日本对洪都拉斯的出口额增长近三十九倍。在巴西,日本投资达到二千五百万美元,占外国在巴西投资总额的1%^③。

随着经济渗透,德意日对拉美的政治攻势和军事情报活动也与日俱增。在加拿大魁北克省、加勒比海地区、巴西、阿根廷和其它几个南美国家,德意扶植了自己的代理人。日本在哥伦比亚等美洲西海岸区域也开始插足^④。从1933年至1939年间,所有西半球国家都出现了不计其数的法西斯组织,在拉美一些国家里,法西斯已经强大到足以进行武装暴动,建立法西斯政权的程度^⑤。

作为征服世界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希特勒计划在拉美国家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破坏巴拿马运河的航运,从非洲越过大西洋进入巴西,并以拉美作为基地轰炸美国。墨索里尼的主要新闻喉舌维其尼奥·盖达曾说过:“巴拿马运河是法西斯的边界”^⑥。法西斯国家设在拉美的所有的领事馆都成了积极传播法西斯毒菌的中心。西班牙佛朗哥政权在“重建西班牙帝国”的口号下,也参加了轴心国的活动。

德国和日本还在拉美特别是在南美建立了庞大的间谍机关窃取美国军事情报。1936年间,美国破获的汤普逊案、山口间谍案,以及1937年德日间谍相互勾结在拉美和美国的大肆活动,引起了白宫当局的严重忧虑^⑦。有些拉美国家还聘请德意军人担任军队教官,按法西斯方式训练部队^⑧。

法西斯在拉美的渗透,危及到美国垄断寡头的根本利益。三十年代中期,代表华尔街老板们切身利益的资本输出大部分都在拉美^⑨。(见下表)。

加拿大	墨西哥和中美洲	南美洲	欧洲	太平洋	非洲	其它
28.9%	12.5%	22.6%	25.7%	9.3%	0.8%	0.2%

因此,美国垄断资本家一方面促使罗斯福政府对欧亚事态取坐视的“中立”政策,一方面却鼓励首脑机构在拉美问题上寸步不让。正是由于拉美局势出现的不稳定状态,才促使罗斯福政府把主要视线放在拉美,因此,受到了垄断资本家们的一致赞扬^⑩。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几个月,罗斯福发表了著名的“隔离”、“防疫”演说,美国大多数人认为这是罗斯福对日本以及德国法西斯的侵略行径发出干涉的讯号。孤立主义者也由此大加指责。面对舆论的攻击,1937年10月12日,罗斯福说:“早在1913年到1921年,我亲自遇到了许多国际事件,那时期,我学会了应该做什么,也学会了不应该做什么。”^⑪实际上,美国对日本在中国的侵略除了空洞地声明之外,并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步骤去制止日本,反而大量地供应日本军火。那么,什么是美国首脑这时认为应该做的呢?从美国对拉美的频繁的外交实际步骤看,罗斯福政府的主要注意力放在拉美出现的不利于美国的局势。

早在1936年,罗斯福就忧心忡忡地说:“征服美洲是写进了希特勒征服世界的教科书里的。”^⑫同年8月,罗斯福宣布要把和平事业象慈善事业一样,从北美发展到南美和中美^⑬。1937年中期,白宫政府更是多次告诫美国公众应注视“极权国家的影响和宣传正在美国和拉美获得阵地”这一事实^⑭。1937年6月,针对德意日在拉美的活动,罗斯福给国会的国情咨文中特别着重提到“外国(指法西斯国家)宣传渗透到了拉美和美国”^⑮。9月17日,罗斯福在美国宪法制定一百五十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惊呼“专制政权对民主政权开始了明显挑战。”“正在扩散的独裁政体以其道德观念正在向(西半球)进攻。”他告诫公众,“不要料想美国将可避免(法西斯)的攻击,西半球仍可处于安宁与和平的境地而不受到进攻。”^⑯由此可见,“隔离”演说就是这些讲话的进一步发展。

“隔离”演说之后,罗斯福并没有去“联合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共同行动”,干涉和遏制法西斯

的日本和德意继续扩大的侵略。这里固然有人们常说的孤立主义派别强烈反对的因素,但作为美国政府的决策者罗斯福,并非是根据某种派别、思潮而行动的。为了美国的根本利益,罗斯福的意向仅仅是将“防疫”实际运用于拉美地区,即在反法西斯的口号下,从以前对拉美的经济政治扩张,发展到建立以美国为霸主的拉美军事安全体系。这就是罗斯福所谓“隔离”与“防疫”在这一时期的真正实质。

日本全面侵华,美国只是发表了一系列泛泛声明,生怕刺激了日本,与这种态度形成鲜明对照。1937年12月27日,罗斯福强硬地表示:加拿大如遭侵略,美国不能袖手旁观。……美国要孤立于二十世纪的世界以外是不可能的,他要为和平不惜任何代价^③。

从1936年至1938年,经过罗斯福、赫尔等美国头面人物在拉美各国长时间的奔走努力,1938年12月9日,由美国倡导的第八届泛美会议在秘鲁利马举行。美国代表团团长赫尔强调,国际上一些“强大的势力……不祥的阴影笼罩着西半球,”“想控制格兰得河以南的国家。”这些势力不但对拉美进行经济扩张和准备使用武力侵犯,还象在奥地利和苏台德区那样,使用渗透和颠覆性宣传的办法“以达到侵略性的政治目标”。对此,美国要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并要求美洲各国密切合作。会议最后通过的《关于美洲团结原则的宣言》宣布:“当任何美洲国家的和平和领土完整遭到任何性质的威胁”时,它们将“进行协商”采取“适当的措施。”为了便于协商,只要有一个美洲国家倡议,即可举行美洲国家外长会议。

美国通过在拉美地区的外交周旋,终于在拉美建立了一个大致完整的实际上带有军事性质的防御体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构成1937年间美国直接利害关系的乃是其近邻拉美的局势。这是因为:第一,拉美与美国有着传统的、不可分割的政治经济联系,在法西斯威胁面前,首先考虑有一个稳定的后方基地。第二,德意日法西斯在拉美国家严重的政治经济渗透,直接威胁到美国自身安全,为了阻止法西斯的侵略,三十年代中期稳定拉美后院是美国首要战略步骤之一。第三,拉美的局势吸引了罗斯福政府的注意力,而日本对中国侵略的扩大,自然成了次要的问题。所以,美国在远东日本武力扩张面前所持的纵容态度,如同对欧洲的中立态度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美国外交战略重心放在拉美暂时无法外移的结果。

养虎为患,美国的纵容政策刺激日本敢于进一步向南洋扩大侵略,把矛头直指美国,终于在太平洋珍珠港给予美国以沉重打击。

注释: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46页。

② 樊元、宋则行等:《外国经济史》现代部分上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7页。

③ 樊元、宋则行等:《外国经济史》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2页。

④ 详见黄枝连《美国203年》下卷,中流出版社,第349页。

⑤ 《国际事务概览》,牛津1941年版,第610页。

⑥⑧⑩ 多萝西·博格:《美国与1933—1938年远东危机》,哈佛1964年版,第315、388—389、343—354页。

⑦ 《纽约时报》,1937年10月7日。

⑨ 科德尔·赫尔:《赫尔回忆录》第一卷,纽约1948年版,第571页。

⑩⑬⑭⑮ 《国际事务文件集》(1937年),牛津1939年版,第604—605、605、554、557页。

⑪⑫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日本),1931—1941年,第一卷,华盛顿1943年版,第317—321、339页。

⑬⑭ 赫伯特·菲斯:《通往珍珠港之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第10、14页。

⑮ “中立法”规定禁运军火包括所有船只,并非仅限于政府船队。

⑯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24页。

⑰ 谢沃斯基扬洛夫:《美国现代史纲》,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391页。

⑱⑲⑳ 维戈兹基等编:《外交史》第三卷下册,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892、897、880页。

㉑㉒㉓ 博格、冈本合编:《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件》,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65、166、198、157页。

㉔ 直至1938年美国才全力发展海军。

㉕ 刘大年:《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58—159页。

㉖ 拉特奈、温豪斯合著:《1776—1940年美国外交政策史》,纽约1941年版,第890页。

(下转107页)

从来雨露多沾溉，盛世欣容作逸民。

作为一个爱国词人、成绩卓著的学者、深受学生欢迎的人民教师，竟然成了被遗弃的“逸民”，能不痛心吗？她和程先生的藏书很丰富，劫后幸存，亦尚可观，这是学者宝贵的精神财富，激愤之下卖尽藏书，当然不是因为生活的贫困，而是对毁灭文化、搞愚民政权的抗议。

程先生摘帽后也获准退休，按理说患难夫妻共度晚年的愿望，可以实现了。其实不然，程先生还得在沙洋放牛，有时请假回来小聚，又匆匆分别，所以诗中有“谁知归隐日，依旧隔云天”之叹。

一个品格高尚的人，虽因居穷巷，而仍能葆其芳洁的志行，也有其家庭和友谊的乐趣。有一天，女儿丽则在路上拾得腊梅残枝，回来插在瓶水之中，沈先生触景感赋：“残萼能余几，孤芳自不同。名园盛桃李，留汝伴寒松。”这不正是她那芳洁品格的写照吗？她对友谊、爱情，都非常忠诚执著，而给她精神上最大的慰藉，是她的外孙女张早早。好象只要早早在她的身边，一切忧伤都丢到九霄云外去了，家庭就洋溢着生活的乐趣。我们读着《早早诗》，会情不自禁地拍案叫绝，惊叹这位词人和擅长近体诗的作者，居然写出这首长达九百余言的古体诗，而语言又是那样朴素自然、清新活泼，描写早早娇小玲珑、刚健窈窕、长眉美目、肤色如玉似雪的形象，写得细腻、具体，诗人通过一系列具有儿童典型特征的细节描写，把早早天真活泼的动作、有如天籁的语言、真挚无邪的感情，活生生地表现出来，真是活灵活现、入神入化、个中人物呼之欲出。左思的《娇女诗》、李商隐的《骄儿诗》，比之于《早早诗》，未免相形见绌。这又是与沈先生曾从事短篇小说和新诗创作的艺术素养分不开的。诗中作者对外孙女的祝愿，是既朴素又虔诚、既善良又酸辛的，留下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印记和老一辈知识分子理想破灭的痛苦教训。

一九七六年秋，“四人帮”覆灭的消息，沈先生感到非常高兴：“一朝清海宇，垂老庆升平。”但当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尚未改变，她感到得以全身躲过那场浩劫已很幸运，今后能有个著书立说的环境，“传世待书成”就是她最大的心愿。

一九七七年春，她偕同程先生去南京等地探望久别的亲友。“东湖偕隐客，乘兴下金陵”，心情是开朗、欢悦的。不料就在六月二十七日返回珞珈山寓所的途中，因车祸不幸逝世。这无疑是个极大的损失。他们的亲友和学生感到非常悲痛。

值得告慰沈先生的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央正确路线的领导下，全国出现生机蓬勃的大好局面。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正得到全面的贯彻落实，沈先生的诗词创作和学术专著，经程先生整理后，陆续出版，贻惠后人，留芳学林，先生也谅必含笑于九泉。

（上接95页）

③⑦ 明顿·司徒尔特：《繁荣与饥谨的年代》，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36、459页。

②③ 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54页。

③④ 扎卡里亚斯：《秘密使命》，群众出版社1980年版，第26—43页。

③⑤ 洪育沂：《国际关系简史》，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56页。

③⑥ 陶大镛：《世界经济与独占资本主义》，中

华书局1950年版，第54页。

③④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外交政策》，牛津1979年版，第122、129页。

④⑥ 芦田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史》，转自“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第二期第54页。

④③ 多萝西·博格：《评罗斯福的〈检疫隔离演说〉》，《政治科学季刊》第12期，哈佛1957年9月，第405—433页。